

陕西小学教育的发展及特点(1912~1937)

王豪杰

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青海 西宁

收稿日期: 2022年5月5日; 录用日期: 2022年5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2年7月5日

摘要

小学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核心。晚清至民国初年是国家动荡和政策大变革时代。陕西小学教育也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但由于军阀混战, 加之天灾, 发展水平一直较低。国民政府时期, 政治的相对稳定, 陕西小学教育在学校建设、入学率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地区发展不均衡、学习阶段过渡时间较长等问题依然制约着陕西小学教育取得更好的成绩。本文以民国成立前后为开始, 至抗日战争爆发, 并挖掘国民政府时期陕西小学教育的特色。

关键词

1912~1937, 陕西省, 小学教育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imary Education in Shaanxi Province (1912~1937)

Haojie Wang

College of History,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Received: May 5th, 2022; accepted: May 24th, 2022; published: Jul. 5th, 2022

Abstract

Primary education is the core of school education.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as an era of national turbulence and great policy changes. Shaanxi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also began to take the road of modernization. But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low because of warlord infighting and natural disasters.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government, Shaanxi's primary education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school construction, enrollment rate and other aspects due to the relative political stability. However,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long transition time of learning stage still restrict Shaanxi's primary education to achieve better results.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excavat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Shaanxi primary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national government.

Keywords

1912~1937, Shaanxi Province, Primary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关于近代陕西小学教育的研究，除了部分资料的大致概括，还并未有学者涉及，与之相关的研究仅有李琳的硕士论文《陕西小学教育研究(1927~1937)》[1]。主要从陕西小学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小学师资力量、小学教育经费、小学教育特点等四个大方面来研究。笔者在李琳文章的基础上，增加研究对象，扩充时间脉络，试图探讨清楚 1912~1937 年间陕西初等教育的状况。

2. 近代陕西小学教育发展的社会背景

陕西省地处内陆，位于我国西北部，是一个南北狭长的地区，南北自然条件存在差异。因此根据自然与人文因素，将陕西省大致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地区。关中和秦岭以南的汉水谷地适合农业种植，“西起宝鸡东至潼关，东西长 300 余公里”[2]，素有八百里秦川之美誉。张仪曾称赞“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贾，沃野千里，蓄积多饶”[3]。并且兼有“崤函之固”[4]。这些有利的条件，“使关中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5]。又是西北地区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及门户，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陕西地区自晚清以来至民国初年，战争动乱频发。据不完全统计，1900 至 1909 年间，陕西各地大型反清斗争就达 17 次之多。由于国家政局的动荡，陕西军阀之间也是频频伐交。除此之外，在陕西军阀暴政淫威下，大量种植鸦片，倒卖国家文物，设立各种苛捐杂税，“如斗捐、附加税等”[6]，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倒行逆施。人民百姓因不堪重负，不断掀起推翻军阀腐朽统治的运动。战争不仅使人民流离失所，也直接影响了教育事业。“省十余年来，兵燹频仍，灾害深重，民困未尝少苏，教育濒于破产。”[7]

古代时期的陕西与其他地区相比，灾害较少。而进入近代以来，陕西成为灾害多频发的省份之一。1877 年中国发生了特大灾荒——“丁戊奇荒”。此次灾祸祸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直隶等省。《续修陕西通志稿》曾载陕西全省在此次灾害中共有约 314 万人口受灾。华阴县、延长县、蒲城县、郃阳县等死亡者约三分之一，赤地千里。《民国华阴县志》记载五十年多年人口仍未恢复。可见当时灾害严重之厉害。20 多年后陕西又发生了一次大旱——“庚子大旱”。陕西全省“道瑾相望，十不活一”[8]。据《政治家年鉴》统计，“此次大旱导致陕西约 250 万人死亡”[9]。丁戊奇荒本来就给陕西人民难以喘息，而相隔仅 20 年又发生了一次大旱，期间水灾、虫灾、霜冻相继不断，让农作物减产或颗粒无收，百姓饿殍千里。根据《中国灾害史年表》记载，1644~1912 年间，陕西旱灾、水灾、地震等灾害多达 200 多次。民国初期，“陕西仅大型的自然灾害就有 7 次之多”[10]。1920 年，陕西、河南、山东发生旱灾，

灾民近 2000 万，死亡约 50 万。1928~1929 年陕西全省大旱，百姓颗粒未收，灾荒频发，使得教育经费短缺，多校皆因经费而宣布停办，例如“私立尊德女子初级中学”[11]。

社会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清末以来陕西战争频繁加之灾害又发，陕西经济发展缓慢。军阀主政期间为了供养军队的开支及自己的花销，强迫百姓大量种植鸦片，导致粮食减产严重，年年入不敷出，灾民成群。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反观近代陕西工业，由于交通不便，又深入内陆，并没有大型工厂，仅有小规模纺织业有了发展，但其生产方式落后，产量低，未能对陕西经济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贡献。整体而言陕西经济发展缓慢，本省运转都自顾不暇，没有多余资金去补充教育的发展。并且天灾人祸频繁，也导致陕西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停滞不前。

随着国民政府主持陕西省，三秦大地逐渐恢复稳定，财政收入有所提高，加之自民国以来不断渲染教育强国论，以及中央补助与地方开明人士的支持，陕西的初等教育开始逐步发展。

3. “初等”与“高等小学校”

(一) 学制的转变

1840 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国家秩序较过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复杂，这也使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废八股，学西学”，教育在逐步的前进。

1903 年，《钦定学堂章程》正式颁发，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正式规定小学教育的章程。将小学分为初、高等。初等小学堂 5 年，高等小学堂 4 年。1904 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确立了各级小学堂的办学宗旨与学校规模。1906 年正式设立学部，“拟设五司，每司分设数科”[12]。其中普通司下设“小学教育科”[13]，专门负责小学堂的维持、教课课程、设备、规章制度、劝学所以及与地方协调经费等一切事务。教育部门成为独立的体系，是教育近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推动了我国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1909 年为了进一步详细规划小学堂，再次修改小学章程，分初等小学堂为三种：完全科 5 年，简易科 4 年或 3 年。1910 年又规定初等小学堂 4 年，高等小学堂 4 年。陕西省遵循政府命令，大量改组旧式书院、私塾。全省在 1903~1909 年间基本完成全省的改组工作，保证每州县至少有一所高等小学堂。设立“陕西大学堂”[14]处理陕西教育事务，提出“敦品优先、尊君亲上”，并教导学生以“热爱陕西，承续关学，为地方建设献力”为己任。

民国成立初年，教育部初步更改课程设置，“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小学手工课应加注重。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初等小学算术科，自第三学年起兼课珠算”[13]。后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将各级各类的学堂改称为学校，负责人由堂长改称为校长。并规定了小学教育的教育新宗旨，“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展，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技能”[13]为教育目的。初等小学学制由五年减为四年，高等小学由四年减为三年。其教学科目主要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15]。1915~1916 年公布《高等小学校令》，规定修业年限为 3 年，“以完成初等普通之教育为宗旨”，为中等学校提供合格生源。教学科目的变动，可根据各地方情况，由县、省教育者认可进行增减。1919 年教育部公布《全国教育计划书》，提出“属于普通教育的有补助教育经费”[16]，督促各地区应普及基础教育。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渐形成“壬戌学制”将小学修业年限改为 6 年。并将前 4 年初等小学的教育规定为强制的义务教育。规定儿童入学年龄为 6 岁。教学内容主要依从三民主义，“普通教育需根据总理遗教，陶冶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15]。此外，各学习阶段可根据地方特有省情单独设立。此规定使地方拥自主权，面临不合适的情况可自行调整，避免学制的呆板和硬性统一，体现了学制的灵活性。

民国初年陕西省长期受天灾人祸的影响，对于许多公文执行起来十分困难，但也提出了一些方案如

“《关于小学教育案》《关于师范教育案》等”[17]。国民政府成立后，社会局面相对稳定，陕西出现了一批教育家或教育重视的官员，例孙蔚如、赵寿山、杨虎城等。使得这一阶段陕西的教育进入稳步发展、逐渐形成有陕西地域特色的教育模式，如1935年长安县自编小学社会和自然科乡土教材等，这类自编教材在陕西各地多有使用。其内容与儿童生活密切相关，对国家统一教材进行补充，对儿童形成爱国爱乡的观念大有裨益。其余各级教育都有显著的发展。

(二) 学校建设

清末时期，陕西省官办与私立小堂为数甚少。清廷先后下令筹建学堂，颁布学堂章程。陕西开始大规模的新办和改建学堂(如表1)。随着乡试、会试、生童岁科考的停止，小学堂不断增加。这一时期，一批批有识之士也捐资办学，例如“甘园学堂”等。

Table 1. Table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primary schools in some counties of Shaanxi Province from 1902 to 1907

表 1. 1902~1907 年陕西省部分县小学堂设立及改建情况表[18]

	建设(改造)时间	过程
长安县	光绪三十二年	官立高等小学堂一，少墟书院改设
咸阳县	光绪三十年	官立高等小学堂一，渭阳书院改建
洛南县	光绪三十一年	官立高等小学堂一，洛源书院改建
山阳县	光绪三十年	官立高等小学堂一，丰阳书院改建
大荔县	光绪三十二年	官立高等小学堂一，冯翊书院改设
潼美县	光绪三十二年	官立高等小学堂一，书院并考院改设
朝邑县	光绪三十年	官立高等小学堂一，华原书院改建
华州	光绪三十一年	创建官立高等小学堂一
蒲城县	光绪三十二年	官立高等小学堂一，书院改设
华阴县	光绪三十一年	官立高等小学堂一，云台书院改设
武功县	光绪三十二年	官立高等小学堂一，绿野书院改设
三水县	光绪三十一年	官立高等小学堂一，书院改设
凤翔县	光绪三十二年	官立高等小学堂一，正谊书院改设
佛坪厅	光绪三十二年	创建官立高等小学堂一
汉阴厅	光绪二十九年	官立高等小学堂一，育英书院改设
肤施县	光绪三十二年	官立高等小学堂一，金明溯源改设
洛川县	光绪三十二年	官立高等小学堂一，朝阳书院改设
米脂县	光绪三十一年	创建官立高等小学堂一
榆林县	光绪三十一年	创设官立高等小学堂一

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时期开始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逐步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全国的小学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陕西省的小学教育也初步发展起来了，无论是学校、学生总体都呈上升趋势，1912至1916年陕西小学校统计如下(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schools, students and graduates of primary schools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1912 to 1916
表 2. 陕西省 1912 至 1916 年间小学校学校、学生、毕业生比较表[18]

	时间	国民学校	高等小学
学校	民国元年	1887	112
	民国二年	2957	128
	民国三年	4393	136
	民国四年	4913	140
	民国五年	5082	145
学生	民国元年	46,746	5608
	民国二年	74,607	7125
	民国三年	106,592	7707
	民国四年	121,176	7917
	民国五年	123,249	8543
毕业生	民国元年	924	464
	民国二年	2693	850
	民国三年	2381	1506
	民国四年	3207	2262
	民国五年	3455	2083

1929 年, 关中发生了大旱灾, 尸横遍野, 饿殍千里。让陕西的教育雪上加霜, 根据 1932 年度教育部统计(如表 3), 与全国中西部省份相比, 陕西初级小学的发展较为滞后。但随着陇海线通车至西安, 国家财政的支持, 人口增加, 教育开始恢复。1933 年邵力子主陕, 主张大力发展教育, 制定《陕西省义务教育委员会组织规程》《陕西省义务教育经费管理办法》《陕西省各县办理义务教育人员奖惩办法》和《陕西省实施义务教育第一期计划》, 令各县遵照办理, 划分实施义务教育的基本区域, 以自治区之保、乡、镇为单位, 召集民众组织短期小学委员会, 自筹经费, 调查学龄儿童, 设立短期小学强迫儿童入学等事宜。使陕西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升。教育人士周学昌曾对此评价到“使此三年来之陕西教育, 能由筚路蓝缕之状况而呈繁荣滋长之气象” [19]。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staff and funds of primary school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in 1932
表 3. 1932 年度全国中西部初级小学校数量、教职员、经费比较表[20]

地域别	校数			教职员			经费	
	公立	私立	共计	男	女	共计	岁入	岁出
江苏	817	201	1018	4231	1337	5568	1,654,105	1,659,407
安徽	525	206	731	2418	522	2940	690,721	728,635
浙江	772	447	1219	3696	1043	4739	1,141,996	1,183,176
福建	584	562	1146	4257	832	5089	1,205,893	1,212,916
广东	1483	6736	8219	11,976	1892	13,868	4,976,505	4,929,232
广西	1081	41	1122	3543	237	3780	1,103,859	1,213,292
湖南	592	355	947	2018	439	2457	623,192	648,327

Continued

江西	262	222	484	1485	265	1750	590,579	590,579
湖北	188	107	295	1397	437	1834	862,918	881,488
陕西	254	62	316	712	128	840	246,662	259,691
山西	730	42	772	1055	269	1324	287,387	282,889
河南	939	53	992	3313	636	3949	1,220,383	1,220,383
山东	1237	116	1353	3334	625	3959	1,301,639	1,160,970
河北	982	139	1121	3256	652	3908	1,510,160	1,490,271

4. 小学教育的师资力量

学堂、私塾，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长期的地位，是古代教育的场所，是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而私塾教师，对于各种人事活动，如调解纠纷、清核账目、问字代笔，及各项兴革事项，悉居于指导地位。随着新学校的大量建设，新式教育下的师资紧缺。长时间内，学校的教师多为私塾先生。虽然教育厅再三训令改良私塾，并制定了实施策略，希望能取私塾之长为小学教育服务，并尽力注意不干扰现有小学校的发展，但是成效不大，多为“新瓶装旧酒”。

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开始逐渐改变现状。《小学校令》规定“凡教授小学校之教科者，为本科正教员；其专授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农业、缝纫、英语、商业之一科目或数科目者，为专科正教员；辅助本科正教员者为副教员”[21]。国民政府成立后，规定小学级任教师或专科教师必须符合以下任职资格条件：“师范学校毕业生；旧制师范学校本科或高级中学师范科或特别师范科毕业生；高等师范学校或专科师范学校毕业生；师范大学或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系毕业生”[22]。而对于没有达到要求的教职员，可以由相关的教育行政机关组织小学教员检定委员会检定，合格的也可以担任小学教师。教师实行聘任制，期限为一年或半年。

陕西的小学教员主要来源于，师范学校、其他学校和非学校毕业，教员紧缺水平还参差不齐。根据1930年统计，陕西全省的小学教员中，“师范大学及高等师范毕业生占百分之五，旧制师范及高中师范科毕业生占百分之二十，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占百分之五，中学毕业生占百分之二十，短期师范毕业生占百分之三十，检定及合格者占半分之十，不及格占半分之十”[18]。随着陕西小学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师资力量薄弱，省政府开始创办师范讲习所，培养新教员。

为弥补师资力量的不足，国民政府还加强了对私塾先生的培养。教育部虽极力主张取消私塾改为新式学校，然“以时局俶扰，学校课业无常，教育设施既不能普及，而设施之效率又不能履社会之望，以故近年各处私塾且于取缔声中潜滋暗长之势。学校毕业生用途有限，或亦充塾师糊口，所授功课亦不恤徇时好以支配之；或杂授教科书，茫然为骑墙之计，托名改良，腐儒之无赖者转相仿效，遂成风气”[23]。陕西省政府随之也颁布一系列文件，例如《陕西省整顿私塾办法》和《陕西省各县塾师假期训练班办法》等，要求各地方教育局视区域情形而定，快速成立塾师训练所，各县境内资格不合格的塾师必须利用假期时间入塾师训练所接受训练，每期至少需三个月。“县应利用每届假期举办塾师训练班，凡县境内私塾塾师均须入训练班受训，如有经召集违抗不到者，即取消其塾师资格。”[24]省政府规定的初衷，并非是对塾师的蔑视，而是期望通过科学的培训，扩展其教育知识能力，培养其教学水平，向新式小学教师转变，在渐变的过程中进一步粗肌新式小学教育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陕西小学教育的近代化发展。

5. 陕西省初等教育的发展特点

(一) 发展道路曲折

陕西虽位于西北，但地理位置优越，八百里秦川，且有崤函之固，军事战略地位险要，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在混乱的民国，陕西成为了西北军阀征战的主战场。军队人数超过学生人数，许多学生被强征入伍，教学秩序混乱，同时许多军队缺乏纪律性，所到之处，肆意破坏、贱卖学校设备，给学校造成严重损失，并常常占据学校场地。“过去西北各省驻兵最多，年有内战发生，如冯直一役，冯军三十万人退到陕西甘肃绥远等省，穷困的西北财政，怎能供养这许多的军队，因是不得不向老百姓重重征取。”^[25]此外，自然灾害频发也是陕西教育曲折发展的原因之一。陕西自然灾害种类繁多，有水灾、旱灾等，几乎年年有灾荒，且受灾区域面积广。其是以 1929 年的旱灾最为严重，全省 92 县，县县有灾。蒋杰就曾写道“实在过去未久更说不定是来日方长”。由于天灾人祸的不断，陕西省的教育事业自然不容乐观。据陕西省档案馆资料《陕西省民众教育委员会会务概况》统计，截止 1929 年 12 月，陕西民众不识字者在 70% 以上，以当时的人口来论，至少有 700 万的文盲。

(二) 地区发展不均衡

根据陕西省教育厅 1932 年小学建设统计数据来看(如表 4)，全省 92 县都已广泛建立小学校，由于灾害影响有 16 县，因大灾还未恢复或是数据没有及时上报，导致数据缺失。总体来说，小学教育基本覆盖陕西省各县。

Table 4. Statistics of primary schools in some counties of Shaanxi in 1932

表 4. 1932 年陕西部分县小学学校统计表^[26]

县市名	初级小学				小学				
	总计	公立		私立	总计	公立			私立
		计	县市			区立	计	县市	
长安县	545	15	15	530	28	12	11	1	16
临潼县	45	5		38	9	8	2	6	1
渭南县	203	2	2	201	9	4	2	2	5
大荔县	171	7	5	164	7	7	7		
凤翔县	31	31	1	30	5	5	5		
咸阳县	43	3	2	40	3	3	2	1	
华县	248			248	6	2	1	1	4
华阴县	107	49	1	48	58	5	2	1	3
户县	235	4	4	231	10	2			8
兴平县	128	120	120	8	3	2			1
合阳县	298	298		298	8	8			
礼泉县	4	4	4		1	1	1		
韩城县	205	3		3	202	4	4	4	
平民县	9	8	1	7	1	1	1		
旬邑县	72	30	30		12	1	1	1	
永寿县	48	1	1		47	3	3	3	
高陵县	2	2	Z			2	2	2	
于阳县	38	38	2	36		1	1	1	
邠县	94	94	88	86		1	1		

Continued

三原县	17	17	17	5	2	2	3
保安县	6	6	6	1	1	1	
延长县	10	10	10	2	2	2	
佛坪县	3	3	3	1	1	1	

从上表可以明显看出,陕西省小学分布极不平衡,长安县、渭南县等大县小学校设立多达几百余所,而佛坪县、礼泉县等的小学校只有屈指可数的个位数,小学校数量相差数可达数百倍。

由于地理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的差异,长此以往就造成了陕西初等教育学校分布的不均衡性。第一地理层面,陕西北部为黄土高原、南部为秦巴山地,交通不便,而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地势平坦,来往商贸频繁。在地理位置上便奠定了关中地区的优势。第二政治决策,政治力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地区政治力量的大小影响着区域教育资源优先分配及分配多少。关中地区从古至今一直是陕西的政治中心,与陕南陕北相比,政策支持力度大,所以在教育资源分配时,省立小学在长安县、渭南县、咸阳县等关中地区,创办较多。教育资源较陕南、陕北地区更具优势,为该地初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第三经济基础,由于办理小学教育需要长期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所以从一开始就注重先在大城市推广,再进而逐渐向乡村渗透。经济的发展是初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发展的规模与方向,若失去了经济条件的支撑,小学便难以维系与发展,它的存在与发展受经济条件的影响尤为明显,而教育经费的多寡最能体现出地区经济条件的差异。

(三) 呈现明显的过渡性

自民国成立起,就要求各地取缔私塾、建立新式小学校。然而大量的私塾依旧长期存在。直至国民政府时期,私塾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出现了私塾与新式小学并存的现象(如表 5)。

Table 5. The situation of private schools in Shaanxi and its neighboring provinces in 1935

表 5. 1935 年陕西及周边几省私塾情况略表^[27]

省份	私塾数	私塾老师数	招收学生数	年收学费数
湖北	6656	6680	134,418	527,475
四川	13,924	14,044	246,874	783,100
河南	8952	8952	152,219	380,099
山西	628	628	9111	28,481
陕西	1348	1333	25,118	81,745
宁夏	1411	1411	34,305	59,261
青海	8	8	203	366

由此表可以看出,与周围几省情况相比,陕西的私塾数量不多,但仍大量存在。私塾在乡村中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备受人民信任,有适合其发展的土壤。例如“长安县地域广阔,人口繁多,学校设立,有未尽处,于是私塾一时未能尽废”^[28]。蓝田县私塾多达 126 处。并且有些学校名为新式学校,实际仍是私塾先生在教课,教材也是半新半旧。民国本来就是一个思想相互碰撞的过渡时代,不仅是陕西省如此,全国各省市皆是如此。私塾长期存在,说明民众对其仍长期信任。主要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私塾管理灵活,不影响农忙;二是没有年龄限制。从侧面可以看到,虽然国家的教育情况每年再提升,但以及无法满足乡村、底层儿童上学的要求。由传统私塾向近代学校的转变不是急促的,而是漫长的道路。

所以改革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更不是立竿见影，它是通过历史的洗礼逐渐完善的过程。小学教育的发展也是如此，“旧”与“新”的并存是改革中的必经之路。

6. 结语

陕西位于中国西北内陆地区，近代化的小学教育发展缓慢。直到1903年初等小学堂才开始创办。逐步取代旧式私塾、义学学堂等传统的教学方式。民国成立后，国家基本趋于统一，但陕西的政界仍处于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局面，“驱陈斗争”、“驱逐刘振华的斗争”等。1927年宋哲元、杨虎城相继主政陕西，陕西省全境取得了初步的安定，为陕西教育事业的发展打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陕西省政府在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教育政策上，进一步完善，并结合本省情况制定出一系列教育政策，在教育体制、教育质量、教育经费和教师队伍等方面整顿完善初等教育，力求陕西地区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这一阶段陕西小学教育飞速发展，是不容后世忽略的。整体而言，处于国民政府时期和动荡的抗战时期的陕西，小学教育发展明显，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国家特别是教育近代化发展过程中，私塾、义学等旧式教育一直伴随，难以完全取缔，这是近代以来“遗”与“变”一直持续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改革不能一蹴而就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 [1] 李琳. 陕西小学教育研究(1927-1937) [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
- [2] 邱海军. 陕西地理[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33.
- [3] 刘向. 战国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4.
- [4] 贾谊. 新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1.
- [5] 郭琦, 史念海, 张岂之. 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317.
- [6] 西北大学历史系.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202.
- [7] 西全省训政大会筹备处. 民国文献类编续编·政治卷[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 2018: 51.
- [8] 宋伯鲁、吴廷锡. 续修陕西通志稿[M]. 兰州: 兰州古籍出版社, 1999: 146.
- [9] 尼科尔斯. 穿越神秘的陕西[M]. 史红帅, 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9: 89.
- [10]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陕西省志·民政志[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429.
- [11] 刘兰香. 西安教育史[M].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03: 297.
- [12] 不详.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三册)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00: 38.
- [13]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2: 28-449.
- [14] 不详.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四册)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00: 1958.
- [15] 杨昭哲. 民国丛书·文化教育体育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137-149.
- [16]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323.
- [17] 刘新科, 刘兰香. 古都西安: 西安教育史[M].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05: 286.
- [18] 陕西省教育委员会. 陕西教育志资料续编[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0: 29-690.
- [19] 周学吕. 三年来之陕西教育[J]. 教育杂志, 1936, 26(7): 125.
- [20] 国民政府统计局. 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廿四年辑[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330.
- [21] 朱有瓛.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114.
- [22] 宋恩荣、章咸. 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278.
- [23] 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 河南新志(上册)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413.
- [24] 中华民国教育部. 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293.
- [25] 暨大教育系. 近代中国西北五省经济史料汇编(第7册)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5: 255.

- [26]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教育志资料选编(下卷)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289-291.
- [2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683-684.
- [28] 田耕园. 一月来陕西之教育[J]. 新陕西月刊, 1931, 9(1): 106.